唯物史观中社会系统的生成与演进逻辑
——基于复杂系统科学的阐释

徐浩然[1],尹凡华[2]

(1.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北京 100084;
2.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廊坊 065000)

摘要:社会系统生成与演进的底层逻辑,决定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社会系统发端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人类在以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交往关系生产和人的生产为主要内容的劳动实践中构建具有复杂秩序的社会系统,这一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为特定的社会形态。社会矛盾运动推动人类实践能力提升,使社会系统呈现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纵向演化趋势;人类历史成为世界历史后,社会系统内部(国家)子系统间的横向联动作用也愈发明显,深刻影响其纵向演化进程。社会系统的演进是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统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要顺应阶段性发展规律接续奋斗,也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奋发有为。

关键词:唯物史观;社会系统;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

[中图分类号]A81;N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6)04-0001-10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6.04.001

The Logic of 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Social Systems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 Elabo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lex Systems Science

Xu Haoran[1],*Yin Fanhua*[2]

(1.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84, China; 2.School of Marxism, China People's Police University, Langfang, Hebei 065000, China)

Abstract: The underlying logic governing 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social systems determines that achieving a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onstitutes a historical process marked by gradual progress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riginating from the material interchange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social systems with complex orders are constructed by humans through labor practices encompassing material production, spiritual production, relations of communication and human reproduction, which take the form of specific social formations across distinct historical phases. The movement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drives the advancement of human practical capabilities, endowing social systems

收稿日期:2026-04-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5AKS026);2025年度警察大学高层次人才校级专项科研课题(BSKYZX202579)

作者简介:徐浩然(1981—),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复杂系统科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尹凡华(1994—),女,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with a longitudinal evolutionary trend from primitive to advanced stages. Once human history evolves into world history, horizontal interactions among national subsystems grow ever more salient and profoundly shape the longitudinal evolution of social systems. As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systems integrates longitudinal and horizontal advancement, achieving a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requires both persistent effort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aws of phased development and proactive endeavors standing on the height of world history.

Key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ocial system; a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graduality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1]。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梯式递进规律,主要源于社会系统阶段性演进的内在逻辑。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巨系统,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系统分析与系统综合的方法考察人类历史,创立了唯物史观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依据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社会主义是社会系统阶段性演进历程中的一种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包含若干发展阶段。为深入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梯式发展的底层逻辑,有必要通过复杂系统科学深化唯物史观,并深刻揭示社会系统的生成与演进逻辑。

一、社会系统是人的存在形式

人类作为一种生命系统,只有在同自然界的物质变换过程中才能持存;自然界能够为人类提供物质、能量和信息等负熵流。然而,负熵流具有稀缺性。为适应这种稀缺性,人类需要以社会系统的形式进行物质生产,从而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

(一)自然界的物质变换与人的持存

自然界的物质变换主要指自然界发生的物理、化学、生物、大气、环流等物质、能量循环交换活动,以及有机体生理演化、生长发育及其物质、能量交换、循环活动[2]。生命系统是自然界的子系统,因此,生命系统既在其内部完成物质变换,也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后者是生命系统得以持存的必要条件。

生命系统(包括人与人类社会)的第一要务是自我持存,即个体存续、繁衍和演化发展。人类的生命活动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细胞的复制与分裂,人类的繁衍也离不开两性的结合与生育。这些过程必然伴随负熵流(包括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参与,而这些负熵流是生物个体通过物质变换获得的。生物必须持续地从外部环境中获取负熵流,才能作为生命而存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3](P209)。首先,人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4](P560),这表明,人本身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次,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直接的生活资料”以及“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5]。最后,自然界为人提供了认识对象。植物、动物、水、空气、石头等自然界的事物,既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也是艺术创作的对象,从而构成“人的精神的无机界”[5]。

由此可见,人的存在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自然界提供的负熵流。如果自然界能够提供充足的负熵流,那么每个物种都有条件不断繁殖。然而,自然界无法为人类提供所需的全部生存资料,一些生命活动必需的生存资料是有限的,这就导致了人类对这部分资源的竞争性使用。此外,负熵流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不均衡,人类的需求在具体时空中也分布不均衡,这意味着人类面对的资源稀缺具有相对性[6]。简而言之,兼具普遍性与相对性的负熵流稀缺,是人类持存的基本外部条件。

人类如何应对负熵流的稀缺状况?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指出,“适应性造就复杂性”。生命现象的标志之一,是生命体能够接收外部刺激、

作出反应，并不断优化这一过程。“刺激—反应”机制是系统同环境相互作用的前提，人类基于这一机制作出适应性行为。面对兼具普遍性与相对性的负熵流稀缺性问题，人类的适应性策略是通过开展物质生产来改善负熵流稀缺性的状况。

（二）劳动作为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过程中的中介

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7]，劳动既是社会系统与自然环境互动的中介，也是二者相互作用的具体形式。人类通过劳动与自然环境进行物质变换、生产各类生活资料，从而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需要。构成劳动的一般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劳动就是“这些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8]。马克思恩格斯从多个维度阐明了这一中介作用的意义。

第一，劳动引起并调控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9](P207-208)。从这段论述可以提炼出两层核心内涵：其一，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这一论断表明劳动本身是生产与消费的统一，即改变自然物形态的物质生产与支撑该生产的物质、能量消费的统一。其二，劳动是人类特有的、自觉的能动性活动，其将人体内蕴含的自然力不断转化为自控力，把自然界不断转化为“人的无机身体”[5]，使人类社会逐步获得相对独立性。

第二，劳动是人类进化的必要环节。劳动工具的使用拓展了古猿的活动范围与感知能力，刺激并促进其神经系统发育。劳动过程中群体协作的需求促成语言的产生，这使得古猿大脑中形成了相应的语言功能区，继而推动意识和思维的形成与发展。恩格斯指出，“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4](P554)。在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古猿脑逐渐进化为人脑。人类在劳动过程中促进了身体进化，如直立行走、脑容量增大、手部灵活性增强。总之，人类的物质形体塑造，以及人类的意识和思维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劳动的推动作用。

第三，劳动塑造了人类区别于动物的进化模式。当人类开始生产自身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时，“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3](P519)。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人类能够借助劳动资料“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于是，“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9](P209)。由此，人类形成了区别于动物的进化模式。现代文化人类学将进化模式分为两类：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生物进化是遗传基因的进化，又称体内进化；文化进化是文化传统和发展模式的进化，又称体外进化[10]。劳动是人类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对象物的信息结构在人类思维中迭代并在劳动中转化为实践成果；同时，劳动又是依赖工具系统的活动，物化工具系统的迭代升级逐步将人类从劳动过程中解放出来，推动劳动的间接化水平不断提高。简而言之，劳动塑造了人类以体外进化为主的进化模式。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生物，并能以远超其他物种的速度实现进化，是因为劳动实践。

第四，劳动使个体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社会系统的物质结构、信息结构正是在劳动的基础上构建而成的。劳动具备客观目的性和条件性，促使人们采取相应的活动方式，建

立并发展与劳动相适配的生产关系,形成一定的生产组织,即生产劳动的社会形式。如劳动资料的占有和使用、劳动分工和合作、劳动产品的分配和消费等生产关系,以及部落、家庭、庄园、企业、国家等广义的生产组织。人类社会的层级秩序和社会再生产功能由此得以涌现。

(三)社会是人类劳动实践的适应性形式

人本质上是社会性存在,每个人都必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与他人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同样,劳动不是某一个体的单独活动,而是社会性的劳动,它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借助某种社会形式开展的。"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是不可思议的。"[11]

个体为什么选择以集体的形式存在和发展,或是以个体聚合形成社会系统的方式存续?究其原因在于实现社会系统的涌现性,而涌现性是系统的基本特征之一。系统整体的功能和特征,并非各个孤立组成部分的功能"机械加总";当多个元素构成一个系统时,系统会展现出单个元素所不具备的性质或功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分工时指出,分工与协作能够使社会系统涌现出新的生产力——集体力,而这种集体力正是社会系统中涌现性的典型体现。他认为,即便在生产条件未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协作也能将"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9](P379)。这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体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9](P378)。这种集体力从何而来?马克思列举了人与人之间的非线性作用创造集体力的多种表现,如"一方面,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另一方面,协作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9](P380-382)。社会系统涌现性的具体表现与产生涌现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人类尚未完全掌握。当前,人类以社会形式创造系统的涌现性红利,并随时随地享用这种红利。

二、社会系统依赖人的持续生产

"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3](P187)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依赖于社会成员持续开展生产与再生产活动。人的生产实践是一种全面的生产活动,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交往关系生产和人的生产四类活动。人类在生产过程中,全面构建起社会的复杂秩序。

(一)社会系统是全面生产的产物

社会系统是一个持续进行生产活动的系统,这是其存在的基本形式。从系统动力学的视角来看,社会作为一种生产系统,是由增强回路和调节回路构成的网络。其中,增强回路能够强化事物原有的变化态势;调节回路则通过自我调整抵消相关变化。系统中所有动态变化均源于这两类反馈回路的交互作用。受增强回路驱动的生产属于自我扩张型的增量活动:在生产条件完备的情况下,每一生产周期的产出都将推动下一周期扩大生产规模。资本增殖运动、人口指数级增长等现象,都受增强回路支配。社会系统生产的特殊复杂性体现为:四类生产中某一生产部门的活动都构成其他生产部门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在制约某一生产活动的调节回路中,都有其他类型生产活动参与。因此,社会系统内部良性的生产活动,必然是四类生产相互协调的全面生产。

马克思恩格斯将四类生产活动视为社会系统的整体生产力,它们互为基础和前提、相互渗透和贯通、相互制约与转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了这种复杂的统一性和整体性:"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

配”[3](P186)。独立个体就在这四种生产领域中开展整体性生产，社会与文明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生成。

（二）社会系统全面生产的内在联系

满足直接生活需求的物质生产，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3](P531)，这种生产包含生活资料生产和生产资料生产两个方面的内容。物质生产是其他生产活动的基础。首先，无论是劳动者自身劳动能力的再生产，还是通过教育培训实现的劳动者劳动能力提升，都需要物质资料的支撑。其次，精神生产的产品若要转化为客观的现实物，就必须以物质生产为中介，并以某种物质产品的形式呈现。最后，物质生产活动不仅生产了特定的物，还同时生产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一旦被生产出来，又反过来成为人们进一步开展生产活动的现实基础。

精神生产是人类生产精神产品的实践活动。人脑通过思维活动创造出新观念和新知识，属于精神生产范畴。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相伴而生，“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3](P524)。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交往关系的生产以及人的生产具有特殊意义。精神生产在观念层面构建物质生产对象的信息结构，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具有现实可能性的精神产品可通过人类劳动转化为物质产品。就人类生产而言，精神生产塑造着人的社会属性，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语言、知识、经验等都属于精神产品。就交往关系的生产而言，各类思想、理论既是对特定交往关系的反映，又能够催生新型社会关系。例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不仅在中国催生了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凝聚力强的无产阶级政党，还推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人类社会是人与人结成的各类社会关系的集合，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形成新的互动关系，或既有互动关系发生改变，这一过程便是交往关系的生产。具体而言，这一过程涵盖生产关系、社会制度乃至国家形态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并不完全是人们有意识、自觉的行为，一些交往关系是在人们的生产与生活中自发形成的。从结构形式来看，社会交往关系往往以条块结构或网状结构呈现。条块结构一般由权力主导的关系构成，存在严格的先后、上下、高低层级划分，如领导与被领导、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关系。条块之间的刚性联系对社会系统的形成和维系来说不可或缺，是保障社会系统宏观有序性的必要条件。社会成员之间还会结成网状关系，如血缘网、同学网、同事网、同行网、熟人网，个体往往同时归属于多个社会关系网络。条块结构和网状结构共同构成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物质、能量与信息借助该网络在社会成员之间传递，支撑着人的生产、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交往关系的再生产等活动。

社会系统的主体是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3](P519)。既然社会是由人组成的，那么社会系统存续与发展的前提就是人自身的生产。人类社会的存续与发展依赖人口的繁衍与人的素质的提高。人的生产包括两个相互衔接的环节：一是通过复制人类遗传信息产生生命个体；二是通过同化人类社会文化信息，使生命个体完成社会化。这两大环节均离不开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与交往关系生产的支撑。首先，人的血肉、骨骼等生理基质的生长，需要物质生产为其提供必要物质资料。其次，人的知识和技能、思维方式、注意力和意志力，以及确立目标、制定计划的相关素质，都需要通过精神产品培育才能得以形成，且这些素质往往是在持续互动的社会关系中培养而成的。最后，作为劳动力的载体，人不仅是

生产活动的目的,也是各类生产活动的核心要素。

(三)社会系统复杂秩序的涌现

从复杂适应系统的角度来看,“序”是指系统诸多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在时间、空间与功能维度上的结构化涌现[12]。正是因为人类能够进行全面的生产活动,才与动物的生产形成了本质区别。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这是因为“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3](P162)。动物只能简单地与自然界保持直接的适应性关联;人却能通过创造性的生产活动,使自然界适应人的需要。全面的生产使人成为类存在物,同理,人只有在类的意义上才能进行全面的生产。正如马克思所言:“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3](P163)。马克思所说的“类存在物”“类生活”等概念,描述的正是个体结成社会系统的存在方式。人类只有借助社会系统这一形式,才能实现全面的生产,并由此使人的生产与动物的生产形成本质区别。

这种区别于动物的类存在形式,具体表现为特定的社会结构:人通过四种生产活动全面构建社会系统的复杂秩序,包括社会经济结构(经济基础)、社会政治结构(政治上层建筑)与社会文化结构(观念上层建筑)。社会系统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与文化结构既各自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是“第二性”的社会现象。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作为一个整体,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观念上层建筑既反映经济基础,也反映政治上层建筑,并通过政治来反映经济。“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3]社会系统各层级在复杂的互动关系中,生成动态的有序性。

三、实践的进步性规定了社会递进演化规律

社会系统的发展是纵向社会形态演进与横向区域融合的统一过程。社会基本矛盾驱动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演进;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系统具有层次结构,国家层面各子系统之间横向互动,在纵向演进趋势中形成倒退或跨越式发展的非线性因素。社会系统的演进是复杂的、非平衡的、非线性的多线程过程。

(一)实践在矛盾推动下具有进步性

人类个体、社会系统的存续所需的负熵流无法由自然界直接提供,二者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必须在实践中得以实现。

实践作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方式,其进步性首先体现在工具的革新与劳动效率的提升上。从原始社会的骨器、石器、木器,到农业社会的青铜农具、铁制犁铧,再到工业社会的蒸汽机、电动机,直至当代的智能设备,每一次生产工具的跃迁都是人类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中,通过反复实践、不断探索而实现的技术突破。不断迭代的生产工具是人的体外进化的表现,这不仅极大地拓展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广度和深度,还显著提高了物质变换的效率,从而为社会系统提供更充沛的负熵流,满足个体日益增长的生存与发展需要。

同时,实践的进步性还深刻体现在人类对自然规律认识的深化和运用能力的提升方面。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阐明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上升规律。面对自然界的复杂现象,人类最初的实践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和被动性。在持续的实践过程中,人类通过观察、实验、总结经验教训,逐渐揭示了自然界

的客观规律。例如，对电磁感应定律的发现与应用，催生了发电机、电动机等一系列重大发明，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遗传规律的深入认识，推动了现代农业育种技术的发展，大幅提高了粮食产量，有效缓解了人口增长与粮食短缺的矛盾。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实现了从感性到理性、从现象到本质的深化，使得实践活动越来越具有预见性和主动性。人类能够更科学、更有效地调节、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减少实践的盲目性和破坏性，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此外，实践的进步性还表现为实践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实践形式的日益丰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人类的实践活动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物质生产领域，而是逐渐扩展到科学研究、文化教育、艺术创作、社会治理等多个领域。这些日益丰富的实践形式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共同构成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复杂系统，推动社会系统在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不断获取和积累负熵流，实现自身的持续发展与演进。

矛盾的客观性决定了实践的持续性，实践中的工具革新、认识深化和范围拓展，共同塑造了实践内在的进步性。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不断提升，实践的形式以及支持其活动展开的物质资料、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要素也随之不断发展，由此，社会系统就呈现了纵向演进趋势。

（二）社会系统演进是纵横双向发展的统一

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揭示了社会演进的一般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它们存在于所有社会形态之中并规定着社会的性质与结构；社会基本矛盾贯穿人类历史始终，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详尽论述了这一过程：社会物质资料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14](P591)；这种桎梏催生了经济基础的变革，随后整个社会“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4](P592)。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单向的线性过程。上层建筑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又会影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循环往复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形态演进的根本动力。

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形态更替，这一过程可以视为社会系统的纵向演进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勾勒了社会形态纵向演进的两条基本线索。一是以人的发展程度为尺度的“三形态”：人的依赖阶段、物的依赖阶段以及“自由个性”阶段。二是以生产关系性质为标志的“五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系统具有层次性，因而，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不能作为统一的公式来阐释不同层级社会系统的演进规律。整体社会系统涵盖全球范围内的人类文明，其次级子系统是具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两个层级之间呈现非线性且不可还原的关联。传统观点认为，社会基本矛盾理论适用于广义的人类社会范畴，或用于考察整体的社会系统，即所有国家层次子系统的集合。实际上，这种观点忽视了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在阐发国家子系统之间横向融合问题上的局限性。国家子系统具有完整的社会结构，是相对独立的文明发展的基本单元，因此主权国家这一层次的社会子系统才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载体。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前，国家子系统主要遵循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纵向自我演化逻辑。

近代以来，人类历史成为世界历史，各地区从相对封闭逐步走向开放，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借鉴与融合成为常态，国家子系统在这一过程中被日益整合，社会系统的整体性、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于是，国家子系统在社会基本矛

盾的推动下,不仅遵循社会形态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纵向演进趋势,还受国家间横向交流互鉴的影响。同时,国家间横向交流互鉴既构成纵向演进的条件(如先发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进入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又能改变纵向演进的进程(如后发国家吸收先进文明成果实现跨越式发展)。国家子系统在纵向演进与横向融合的过程中,塑造了整体性日益加强的社会系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系统哲学认为,"人类系统的发展是纵横向的统一"[15],即"纵向社会形态的层次更替与横向区域性融合一体化的统一"[16]。

综上所述,社会基本矛盾反映的是国家子系统内部的矛盾运动,而国家作为子系统,不能等同于整体性的社会系统。因此,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侧重于揭示国家层面社会形态的纵向演进规律;整体性的社会系统的阶梯式演进规律,要综合纵横双向的演进机制才能得到阐明。

(三)基于社会系统纵横向演进机制反思"单线论"

长期以来,尤其是斯大林发表《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后,阐释社会形态演进路径的"单线论"在理论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该理论将人类社会复杂的历史进程简化为单向的、不可逆的线性发展过程: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17]。若依据此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有完整经历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显然与历史事实相悖。如何认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纵向演进规律,是否适用于世界上所有国家、地区与民族?

马克思恩格斯本着科学审慎的态度,为社会系统的演进勾勒了大致框架,而并未作出细致的说明。他们虽从宏观时空视角提出了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线索,但没有断言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要经历这一线性过程,也没有限定各社会形态阶段的时间跨度。"单线论"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张力实质源于:"单线论"混淆了考察对象(社会系统)的层级属性,继而混淆了社会系统不同层级子系统的演进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所指认的"三形态"与"五形态"纵向演进趋势,适用于整体的、宏观的社会系统,人类历史总进程的不可跨越性在这一层级才有意义。而国家层次的社会子系统不仅遵循纵向演进趋势,还会在与其他子系统的互动中受到横向融合的影响。例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并非一定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3](P567-568)。

整体社会系统的演进历程具有线性特征,而国家子系统因与其他主体存在互动关系,其演进历程具有非线性特征。人类社会整体上沿着"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条线索演进,然而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形态演进,可能呈现倒退或跨越式发展。人类社会现存的社会形态,划定了国家子系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边界。

19世纪俄国革命者查苏利奇正因没有认清这个问题,而对"单线论"产生困惑:俄国乃至世界各国是否必须经历充分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才能进入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问题,经过严谨周密的思考后审慎地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4](P8)。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俄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论

断印证了俄国社会演进的非线性特征。这种非线性特征源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纵向演进的基础——俄国土地公有制；二是横向交互的影响——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

在世界形成“自由人的联合体”之前，社会系统内部的发展不均衡，各子系统的形态演进呈非线性特征，因此共时维度的社会形态演进呈现“多线程”发展格局。“多线程”发展格局意味着，若将某一时刻的时空片段“抽离”出来，就会发现人类社会在不同地区呈现不同的发展形态。当前，世界多数国家处于资本主义社会，若干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一些阿拉伯、东南亚国家仍实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非洲部分地区仍存在具有原始社会特点的部落社会形态。整个人类社会并存多种社会形态，甚至同一社会形态下的不同地区也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系统的演进是兼具非线性和多线程特征的复杂过程。

（四）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递进式发展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充分发展后，通过社会革命取代资本主义的更高社会形态。因此，其核心主题是构建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不再承担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任务。然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率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取得胜利。列宁通过对社会主义革命条件论的变革，将社会主义置于完全不同的历史空间——未完成现代化建设任务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这一历史条件决定：现实形态的社会主义既要完成以生产关系变革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又要承担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核心的现代化任务，社会主义制度与现代化建设由此在实践中实现了有机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主题也由此产生。

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遵循社会系统纵向演进与横向发展相统一的规律。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以生产关系性质变革为标志的纵向阶段式演进，如共产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中国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发展形态。现代化作为一个概念范畴，是在世界历史形成、各民族相互交往的横向发展语境下产生的，本身也具备“发展中国家”对标追赶“发达国家”，最终成为“发达国家”的阶段性演进趋势。社会主义现代化既要在社会基本矛盾推动下遵循纵向演进规律，又要在横向交流互鉴中汲取人类先进文明成果。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双重任务叠加的复杂性，其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质变，而是以阶梯式递进的方式实现量变积累与阶段性质变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由一系列递进式的阶段性发展目标引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性战略目标——从“四个现代化”构想到“三步走”战略部署，再到新时代“两步走”战略安排——正是通过持续的量变积累实现阶段性质变的集中体现。“十五五”时期的目标任务相较于以往更加全面系统，涵盖经济实力大幅跃升、国家治理体系持续完善、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生态环境根本性好转等多方面内容。该阶段既是对前一阶段量变成果的总结，也为下一阶段质变积累创造必要条件。每一阶段的发展成果都构成下一阶段更高目标的现实基础；每一阶段目标的实现都是质变与量变辩证统一的具体体现。质变依托量变的积累，量变指向质变的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正是在这种递进式发展中不断迈向更高阶段。

“十五五”时期是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推进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从“一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每一个递进的发展阶段都需要攻克更为复杂的发展难题、化解更深层次的矛盾。我们要深刻认识社会系统纵向演进的内在逻辑，把握社会主

义现代化阶梯式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不懈努力、接续奋斗。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N].人民日报,2025-10-29(001).

[2] 方锡良.现代性批判视域中的马克思自然观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81-282.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5.

[6] 李建德.制度及其演化:方法与概念[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312-315.

[7] 李节.马克思经济学的现代系统范式[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9:151.

[8] 肖前,李秀林,汪永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修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6.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邬焜.辩证唯物主义新形态:基于现代科学和信息哲学的新成果[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525.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

[12] 徐浩然,胡建涛,张冠玉.执简御繁:坚持系统观念的科学逻辑与思维方法[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4:143.

[1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3.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 宛锦春.人类社会系统发展的纵横向统一:再论和谐世界思想的理论创新[J].科学社会主义,2012(6):57-60.

[16] 冷树青.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微观基础与宏观结构[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61-65.

[17] 段若非.马克思主义及其在当今中国的运用和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73.